

【 家校合作丛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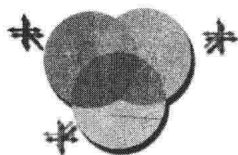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吴重涵 王梅雾 张俊

Home Advantage:

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家庭优势： 社会阶层与家长参与

【美】安妮特·拉鲁 著
吴重涵 熊苏春 张俊 译
吴重涵 审校



家校合作丛书

家庭优势:社会阶层与家长参与

Home Advantage: 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美] 安妮特·拉鲁 著
吴重涵 熊苏春 张俊 译
吴重涵 审校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家庭优势: 社会阶层与家长参与 / [美]安妮特·拉鲁著; 吴重涵, 熊苏春, 张俊译.--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12

书名原文: Home advantage: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ISBN 978-7-5392-7652-6

I. ①家… II. ①拉… ②吴… ③熊… ④张… III. ①家庭结构—研究②学校教育—合作—家庭教育—调查研究 IV.①C913.11 ②G4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181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4-2014-284

**Home advantage: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by Annette Lareau

Copyright ©2000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4720 Boston Way, Lanham, Maryland 20706

家庭优势: 社会阶层与家长参与
JIATINGYOUISHI : SHEHUI JIECENG YU JIAZHANGCANYU

[美] 安妮特·拉鲁/著 吴重涵 熊苏春 张俊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0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本 21.5 印张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7652-6

定价: 50.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来稿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4-329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家校合作的家庭视角

——译者序

吴重涵

《家庭优势：社会阶层与家长参与》(以下简称《家庭优势》)是“家校合作丛书”的第二本译著，是美国当代研究家校合作问题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曾获美国社会学学会教育社会学分会“魏拉德·沃勒尔杰出学术贡献奖”(Willard Waller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和美国教育研究协会颁发的“评论家选择奖”(Critics' Choice Award)。作者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是著名的人类学学者，因对美国家庭教育子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和持久的田野研究而享誉世界，2012年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拉鲁的另一本著作《不平等的童年》于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已为国内读者所熟知。

拉鲁在她的《家庭优势》中，详细描述了社会阶层结构这样的一幅微观运行



机制画面：家长作为社会阶层的一员，如何传递所具有的优势给他们的子女，如何努力利用其资源来帮助子女在学校取得成功。劳作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家长都希望帮助他们的子女，都希望他们的子女获得教育成功。然而，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可以应用的教育资源量与资源种类的不同，导致了他们教育干预（参与）的能力不同，因而干预行动（他们认为是恰当的）的广泛性和深度也大不相同。本书的突出特点，是拉鲁创造性地描述了家长大量不起眼但却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行动方式，揭示出这些细微社会行为的社会意义，从而为我们理解家长的教育参与行为，理解家长在与学校合作中所持的立场、策略和行动，提高家长教育子女的能力，制定有效的家校合作策略，奠定某些学理性基础。

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子女的类特征

我们需要搞清楚家庭、家长教育子女的规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规律，是关于“类”的普遍性联系特征，寻找规律与对事物的分类有关。所以，对家庭教育子女问题的全面研究，需要从各种视角对家庭及其教育方式进行分类，找出每一类家庭或教育方式的规律性特点。这是通过众多研究者的持续共同努力来逐步达成的。对个体研究者（团队）来说，对家庭及其教育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可以有许多基本的视角：家庭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s），家校合作（school—family partnership, concerted cultivation），家庭社会阶层（social class, socio—economic status）与家庭个性（individual personality, variations in world view, personal style, academic inclination, 即个性，多样化的世界观，个人风格和学术性向），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等。很多视角在微观层面又是有交叉重叠的，这些分类甚至“类”的微观交叉重叠为更宏观“类”的层面寻求普遍性特征提供了基础。

在家庭教育子女的“类”研究中，按照社会阶层进行家庭分类来研究家长教育子女问题，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因为子女的教育成功，最大的解释

变量就是家庭的社会遗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成长的大概率影响,见 James Coleman 1966; Jenck 1972; William Sewell, Vimal Shah 1966; 1967 等)。

长期以来,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美国家庭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以为美国的父母尤其在子女小学阶段,对孩子是很放任的。甚至从一些所谓的国内专家建议上,都看到对美国家庭教育孩子的片面描述和曲解。然而,拉鲁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不同的画卷。

拉鲁通过深入的人类学观察表明,放任孩子玩耍和自由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一般只发生在美国低社会阶层的家庭中。在这些家庭中,孩子们通常靠自己的能力、勤奋、性情取得学业上的成功,所以教育成功的机率比较低。

而美国的中产阶级家长其实很重视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重视与学校的互动配合。他们(尤其是孩子的母亲)不仅关注孩子的在家教育活动,而且还试图影响孩子的在校经历。他们积极参加孩子学校的活动和会议,甚至定期充当班级志愿者;他们设法选择对孩子有益的老师,避免孩子落到“差”老师手中。他们要求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甚至有时他们在家教孩子课程;他们在周末和平时下午经常奔波于接送孩子参加经家长为孩子量身定做的活动,如阅读、钢琴、舞蹈、体操、游泳、球类等各种培训班,必要时还会安排(要求)孩子参加特教训练班和暑期学校;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母亲尤其会干预孩子的在校经历。家长们想方设法使学校教育适应孩子的具体情况。在家里,他们有意识地与孩子讨论问题,训练孩子的思维,将他们的思维品质“遗传”给下一代;他们通过各种社会交往培养孩子对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形成中上社会阶层特有的社会惯例。中产阶级的家长认为与学校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参与”,而是“协作”培养,是“伙伴”关系,甚至起领导作用,力图控制和主导孩子教育的主动权(参见本书第四章最后一节, p91)。

拉鲁用事实告诉我们,上述不同社会阶层家庭在教育子女上存在的明显差



异,不仅是家庭是否重视教育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教育价值观差异导致的儿童教育抱负和职业抱负的差异(当然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更是由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能力,家长拥有的社会阶层文化资源(因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家长的职业地位与工作性质等所产生)决定的。

——家长受教育程度因素。中产阶层家长一般都接受了较高的教育,具有对子女学业情况检查、评估、辅导甚至控制的能力,以及与老师在共同语境和词汇下有效沟通的能力,而这些是低社会阶层的家长通常所不具备的。

——家长职业因素。家长一般将其职业地位(更一般意义上是社会阶层地位)看作他们能力的“徽章”。中上阶层家长一般有着与老师相同甚至更高社会声望的工作,他们用自信而审视的眼光对待老师的建议,可以与老师建立非正式的交往关系;而低社会阶层的家长一般从事的是体力而非脑力为主的工作,社会地位较低导致他们一般将老师视为神圣的专业人士,对老师的意见言听计从,缺乏与老师的非正式的社交沟通。他们缺乏信心去理解、去挑战、去平等地面对老师。

更重要的,家长的工作性质影响家庭与学校的关系性质。拉鲁强调不应限制在制度化的组织内(家庭、学校和工作单位内)去分析社会阶层对阶层个体的影响,而是应该考察制度化社会组织之间(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家庭生活与子女学校经历之间)的联系(参见本书第一章,p3)。中上社会阶层的家长通常工作时间较长,并常把工作或与工作有关的活动带回家(或工作场所以外的生活中),工作与家庭生活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工作和家庭生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关联的性质;而低社会阶层家长的工作如流水线工人则有明显的时间分割,工作时间以外的家庭生活与工作无关。这种工作和家庭生活关联或分离的不同状态,会影响家校关系的性质。一是形成了家长对什么是教育的不同看法。低社会阶层的家长视孩子教育为一种不同于他们从事工作的另一种工作而已。学校教育是发生在学校的事件。他们认为学校和家庭之间存在一条

清晰的界限,导致他们学校家庭相互分离的认识。不同的是,中上社会阶层的家长认为无论在校内校外,教育随时发生,正如父亲既在办公场所又在家工作一样,导致他们认为学校家庭作用相互交叠。二是中上阶层家长工作和家庭生活相关联的性质,使得家长的时间较具弹性,容易自主安排参加学校活动的时间;而低社会阶层家长工作和家庭生活相分离的性质,使得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是通常学校与家长沟通的时间较具刚性,家长较难安排参加学校活动的时间。三是家庭生活和工作之间的联系影响家庭的社交网络。中上阶层家庭的家长在工作中通常会建立更加广泛、更加高级的社交网络,并具有教育孩子有效的社交网络的能力,可以从老师以外的同学家长、同事朋友等处获得更多、更具体的学校信息和与教育子女有关的信息,甚至是专业性的建议。

拉鲁的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角度和分析框架,值得我们借鉴。

家校合作的家庭视角

从家校合作的“家庭”和“学校”伙伴关系看,家校合作有“学校”和“家庭”两个视角。学校家校合作行动计划制定的科学性,需要在理解家庭教育行动和教育事件的意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就是我们站在学校的立场上翻译出版爱普斯坦《学校、家庭和社区合作伙伴:行动手册》(以下简称《行动手册》)后,紧接着站在家庭的立场上翻译出版拉鲁的《家庭优势》的初衷。

从《家庭优势》与《行动手册》的对比上,我们可以看到拉鲁从家庭的视角审视家校合作的几个特点:

1. 学理性。爱普斯坦的《行动手册》是一个典型的策略性结构,旨在帮助各级教育行政组织系统化、制度化地开展家校合作工作,改善家长参与的品质。因为学校作为制度化的教育组织,教育工作者的首要目标,是改善学校的办学。所以他们特别关注提高家长参与的策略。教育工作者将家长参与作为他们诸多可以应用武器中的一种,关注有关家校沟通技术、具体实施计划(site pro-



gram)和提高家长参与的策略。所以爱普斯坦关于学校视角的家校合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尤其对学校来说是高度实用的框架结构(当然爱普斯坦的学校视角并不只限于对学校行动策略的研究,她对家长参与、家校合作有着三十年的深入学校的观察、分析和研究积累)。但是家庭视角有着不同作用。当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试图改变家长的社会行为时,家庭视角的研究者则在试图深入到家庭中去,从家庭成员教育行动中去理解行为的意义。家庭视角研究者的责任是考察一系列变量,包括那些不能够通过学校的行动计划和社会政治行动轻易改变的变量。拉鲁在《家庭优势》中对家庭教育子女和家校关系的研究,就是系统的学理性研究,至少不会与有效的改善策略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2. 行动内在动力机制的解析。学理性研究不仅存在于家庭视角的家校合作研究。爱普斯坦等从家庭的外部、从统计学的意义来解释:家长参与的不同会带来子女学业水平的不同,学校改善家长参与品质的策略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这是从外(学生在学校的学业表现)到内(家长参与行为和家校合作行动)的研究。几十年来这个研究领域取得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有关研究综述参见爱普斯坦等著,吴重涵等译《学校、家庭和社区合作伙伴:行动手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p35—46)。而拉鲁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她是从学生家庭内部,从家长的行动中,去理解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内在动力机制。拉鲁用社会阶层差异的视角观察家长参与行为的差异,指出了家长教育子女以及与学校联系的种种行为背后,存在的因果联系;指出家长参与是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局限,是运用有限文化资本的行动,学校或许可以改善,但不可能完全克服这种局限。相对来说,拉鲁对家长参与行为的直接观察和研究,是从内(家庭成员行为的动力)到外(家校合作和家长参与的行为)的。

3. 强调社会阶层因素对家长参与的重大作用。有趣的是,爱普斯坦基于学校的家校合作视角与拉鲁基于家庭和家长的家校合作视角,对于社会阶层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起的作用,认识并不一致。爱普斯坦注重家长参与的效果和操作

性问题,强调学校的家校合作伙伴计划必须面向不同社会阶层的所有学生家庭,关注作为整体的家长参与与社会平等的关系。爱普斯坦学校视角的操作化解释逻辑中,不将家长社会阶层的差异视为无法改变的决定性因素,强调从组织动力学的角度,从技术层面改进所有社会阶层家长参与的策略和方法,认为:只要学校开发并实施了平衡、多样性的家校合作伙伴计划,就可以克服社会阶层对儿童的影响,“使所有家庭能帮助学生在学校中做到最好”(爱普斯坦著,吴重涵等译,《学校、家庭和社区合作伙伴:行动手册》,“引言”,p2)。但在拉鲁等人的家庭视角解释逻辑中,“热情很高的老师们无疑可以调动一些家长的积极性,但教育的不平等不太可能随着劳作阶层家长的参与而改变”(见本书“原书序言”部分,p8)。甚至朱莉娅·格利(Julia Wrigley)在给本书写的序言中,从本质上否定从学校组织层面存在通过家长参与改善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而只能是通过有家长参与的、更加广泛的、政治层面的社会运动才能改变“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教育不平等问题”(见本书“原书序言”部分,p11),并认为“在现代工业化国家,改变阶级不平等模型是非常困难的(Shavit and Blossfeld 1993)。不论教育如何根本改革和扩张,优势阶层的相对优势会得以保留。例外的情形主要发生在瑞典这样的国家。瑞典作出了巨大的、持续的、范围广泛的限制不平等的努力”(见本书“原书序言”部分,p5)。在美国,改善社会阶层教育不平等的努力,主要靠包括家长集体参与的社会政治运动(如1960年代反对学校种族隔离的民权运动)。在拉鲁等人看来,爱普斯坦的组织动力学(组织变量)视角较少用社会阶层来解释为什么家长参与或不参与学校教育,却将家长是否参与归因于他们在整个学年中使用(或不使用)相关策略的结果(见本书第一章,p9)。

或许,我们这里不是要纠结于爱普斯坦和拉鲁从不同视角得出的不同结论,而是要在两种视角的具体论证逻辑中,找到其本质上一致的问题:处于不同社会阶层文化资本的学生家庭,个体家长参与与家校合作的强度和有效性,在制度化的教育组织——学校层面可以能动地得到多大改善?是否需要借助于



更加广泛的、有家长参与的社会运动，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减少社会阶层差异带来的家长参与差异？组织动力学的视角和社会阶层文化资本的视角究竟多大程度和在哪些方面具有更好的解释力？这很值得我们结合我国的国情去做实际调研和分析。

《家庭优势》的姊妹篇

说起《家庭优势》，不能不谈到拉鲁的另一部著作《不平等的童年》。

应该说《家庭优势》与《不平等的童年》属于姊妹篇，都是按照社会阶层对家长进行分类，研究不同的家庭和家長对子女学业的影响，讨论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优势和不平等问题；都是用人类学的方法，观察家庭日常事件和家長教育子女的行动；都是基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解读家庭教育事件和行动的意义。当然，两部著作虽然在研究和写作时间上有重合，但《不平等的童年》成书在后（《家庭优势》从研究开始到重大修改后第二版出版，是1980年代初到2000年，第一版成书于1980年代末；而《不平等的童年》的研究和写作是从1989年到2003年），两者具有很强的逻辑关联性。

但两部著作的着重点不同。《家庭优势》聚焦于社会阶层视角下家庭和家長教育子女的局部画面——家長与学校关系的问题。以社会阶层——家庭文化资本——家長参与学校教育为逻辑线索，专门围绕家校互动合作这个专题。《家庭优势》指出，在共同的对子女学业成功期待的背后，存在家長帮助子女在学校成功的能力的社会阶层差异。独立于家長对子女的期望，阶层属性赋予家長帮助子女学校学业的资源优势和资源劣势。从不同类型的社会阶层家庭（劳作阶层和中上社会阶层家庭）的家長和学校与教师之间的冲突、协作，描述和分析家校合作和家庭教育问题。而《不平等的童年》给出的是家庭和家長对于子女教育的全景画，以“孩子日常生活的组织”为核心，从孩子的日常生活的组织、语言的使用和家校互动合作三个逻辑递进的方面，指出阶层地位的确塑造着家

庭教育的逻辑策略,同时也塑造了符合这些策略的价值观”(参见拉鲁著,张旭译《不平等的童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12—13)。家校互动在《不平等的童年》里,只是一个局部。此外,两部著作搜集数据的方法不尽相同,《家庭优势》中作者大量使用了自己擅长的访谈法了解样本学生家庭的基本情况,而在《不平等的童年》中,作者是带了一个研究团队以对学生家庭日常生活的田野观察为搜集数据的基本方法。

作为质性研究初学者的研究范例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家庭优势》不仅是一部研究家校合作的重要著作,也是学习质性研究方法的范例,是一部优秀的质性研究成果报告。鉴于质性研究的难度和阅读质性研究方法论著作的难度,作者拉鲁的经验是,读质性研究方法论的著作要与读质性研究的范例结合起来,以将理论和研究经验同时呈现于我们的大脑(见本书“附录”部分,p269)。当前质性研究的范例,特别是教育领域的质性研究范本很少,但学习者又很需要。对于初学者来说,尤其是那些附有详细介绍研究背景、研究过程、研究经验和体验《附录》的质性研究报告著作,特别值得一读。应该说《不平等童年》和《家庭优势》都是属于此列,都有介绍研究经验的附录。而《家庭优势》更适合初学者,因为《家庭优势》附录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作者所经历的质性研究全过程的生动故事,包括她在研究中如何选择和进入田野现场,如何进行田野观察与访谈,如何发现和形成研究问题,如何分析数据,如何撰写研究报告,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和经验教训等。

《家庭优势》是作者一个人的独立研究,调研的时间跨度相对较短(两个年度),研究难度、样本数量、研究工作量等都较适合初学者借鉴模仿。而《不平等的童年》是一个团队的研究成果,历时15年(书中“致谢”了16名研究助手,而且现场调研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89年到1997年)。虽然《家庭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没有《不平等的童年》成熟,但是将两本著作按照时间顺序,先研读《家庭



优势》再研读《不平等的童年》，可以学到很多教育质性研究的生动研究经验。

需要再次强烈推荐的是，《家庭优势》附录对研究过程的叙述非常详细，是本书作为教育质性研究范例的一大看点（原书中附录长达 37 页，相当于研究正文约 20% 的篇幅，记录了很多实用的质性研究技巧和经验教训）。或者更准确地说，附录是本书作为严谨的人类学田野研究范例的特色所在。据译者所知，在发表的质性研究成果中，详细将自身的研究过程介绍给读者的教育著作是非常少的。这使得本书不仅成为研究家校合作和家庭教育的重要著作，也可以成为学习教育质性研究的生动参考书。

本书由吴重涵译原书序言、第 1 章和附录，熊苏春译第 2—7 章，张俊译第 8、9 章和再版后记。全书由吴重涵审校统稿。张俊做了英文人名、地名的翻译工作，刘莎莎做了参考文献录入工作。虽然我们以严谨的态度认真工作，但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缺点甚至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读者可以通过邮件联系我们：jxsina@126.com。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得到了江西教育出版社周建森、张芙蓉、熊志娟等编辑和工作人员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原书序言

朱莉娅·格利(Julia Wrigley, 纽约城市大学教授, 社会学家)

本书对美国社会学不同寻常的贡献,是详细描述了社会阶层日常运行中的一幅画面:家长作为社会阶层的一员,如何将其具有的优势传递给他们的子女。社会阶层是美国社会学界经常使用的一个研究变量,但对于社会阶层这个概念为什么重要、社会阶层是如何发挥其影响力的,却鲜有研究。典型的情形,是将社会阶层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或者背景变量使用。通常,研究者不会将社会阶层作为人与社会制度日常性互动的自变量。

拉鲁(Lareau)在本书中向我们展示了家长是如何努力利用他们的资源来帮助子女在学校取得成功的。劳作阶层(working-class,没有翻译成工人阶级,而译作劳作阶层,是因为本书中 class 主要是指家长的社会地位分层,主要根据职业、受教育程度来确定,可以根据需要分为很多层,并无政治含义,所以按照中文社会地位分层的习惯使用阶层一词来对应——译者注)和中产阶层的家长都希望帮助他们的子女。家长这一努力的差异性,在于他们可以应用的资



源量与资源种类不同,行动(他们认为是恰当的)的广泛性不同。中产阶层家长利用他们的社会优势——高社会地位的工作、丰富的受教育背景和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帮助他们的子女在学校教育中取得成功。当然,即使是天赋很高的家长,要将教育优势最大化,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除了家长为子女创造条件存在客观上的差异之外,子女还必须为取得学业成功付出努力。拉鲁这一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创造性地描述了家长大量不起眼但却是十分重要的行动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家长使他们的子女得到最好的老师,在孩子遇到困难时提供额外的资源帮助。

文化资本的概念

本研究的理论,来源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概念。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原是由于解释精英文化如何在代际间传播。本研究是对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的美国化和移植。在美国,人的知识地位不依赖于是否能写出优美的文章,或对于文学传统的深刻认识。缺乏精英文化并不等于缺乏对教育的重视。本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在美国背景下文化资本意味着什么;跟踪描述了中产阶层家长努力使他们的子女在学校布置的学习任务中获得成功。拉鲁向我们展示,不存在被动的文化资本代际传递。文化资本的传递是一个能动的过程。负责任的中产阶层家长们将他们拥有的资本进行“投资”,帮助他们的孩子取得从刚上小学时掌握阅读,直到最终获得 SAT 高分的一系列成就。凭借对各种资源的调动,家长可以自信地与老师和其他学校人员交往。他们在工作中形成的社会交往能力,来督促和影响子女的教育。中产阶层家长的这些行动,导致了他们子女的学校历程,在性质上不同于劳作阶层子女的学校历程。

作者在将文化资本概念美国化的过程中,证明了社会学能够将个体生活历程与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考察,在注重个体行动力的同时,又不把个体的行为作为描述的结尾。中产阶层家长致力于帮助他们的子女,而不会刻意展示他们的阶层优势。他们认为,子女的未来取决于学业成就,因此努力帮助他们的子女

避免在学业中遭遇失败。中产阶层家长们这些期望的背后,是使阶层整体优势产生和保持的社会系统在起作用。家长个体受到社会结构制约,在代际之间进行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但社会系统从表面上显示的是,孩子的成功只是一种个体属性。例如,当孩子学习好时,人们通常会忽略这种学习能力的获得,是很多很多社会过程和步骤的最终体现。而实际上,在每一个中间过程,孩子们能否进入到下一步,都可能受到家长地位的限制或促进。中产阶层家长和劳作阶层家长与社会制度发生的作用是不相同的,而他们的子女就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学习和竞争。

拉鲁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住在富裕郊区的家长们如何监督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观察孩子老师的教学行为,在孩子遇到留级或不能达到阅读要求等不利情况下进行教育干预。当孩子学习遇到问题时,家长应迅速采取行动——这是好家长的应有之意——至少对于中产阶层家长而言是如此。劳作阶层的家长与中产阶层家长一样,也希望帮助他们的子女。他们给孩子穿戴整齐,准时送孩子到校,努力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并在学校表现好。但与中产阶层的家长不同的是,他们几乎不会对解决教育的核心本质问题发挥什么作用。拉鲁所访谈的劳作阶层的家长们认为,孩子的学习是老师的事。他们畏惧于老师职业的专业性,担心自己会教错或误导孩子。他们将家庭和学校视为彼此分离的两部分。

家长参与学校的消极作用

一些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难免有隐含的道德判断,或者赞扬中产阶层家长为子女提供学习机会,或赞扬并证明劳作阶层家长反抗制度的压迫。本研究秉持中立的立场,既避免赞扬,又避免责备。在拉鲁的描述中,社会阶层因素起作用,但不起完全的作用,她将剩余的解釋空间留给了家庭特性,如价值观、个性和学术性向。而且不同的阶层,对于阶层的个体,既有制约的一面,又有让其自由施展的一面。中产阶层家庭虽然能帮助子女学习,但也要付出代价。本书详细描述了家长持续关注孩子学习表现所带来的种种消极作用,探讨了家长参



与的不利一面。

例如，艾米丽——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有阅读障碍。她的父母费尽了心力，半年时间里几乎每天晚上讨论女儿的学习困难问题。艾米丽本人则一上阅读课就感到肚子疼。每当早晨她妈妈考问她单词拼写时，她总是哭泣。她上幼儿园的弟弟总能够比她更多地认出冰箱上磁铁吸附的单词，她为此要承受的优劣对比令她更加痛苦。艾米丽的情况在劳作阶层家庭就不太可能发生。劳作阶层家庭的子女较少获得家庭的学习指导，但他们也较少面对与其他学习好的孩子的恶意对比。劳作阶层的家庭不会像中产阶层家庭那样重视孩子的学习表现，给了他们的孩子更大的精神自由，这或许是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无法享受的。正如拉鲁所指出，“艾米丽的学习成绩不好，给她带来了忧虑、精神负担加重和家庭关系的紧张。这是劳作阶层家庭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不会承受的”（见本书第八章，p177）。老师也饱受这些重视教育的家长过度监视他们的教学之苦。孩子表现不好，很多家长的第一直觉，就是像艾米丽的妈妈那样，去责怪老师。一些有着较高社会地位、受过更高学历教育、比老师更富有的家长，甚至可能会大声斥责和羞辱老师。他们不尊重教师职业所具有的专业性，视老师为被监管和指挥的雇员下属。

人类学理论对本研究的作用

本书精心取得的结论，是通过严谨的人类学方法获得的。虽然研究规模较小，只涉及“2个一年级班级，12个学生家庭，4名老师和2名校长”（见本书第一章，p10），但有着丰富的研究发现。在附录中，拉鲁描述了她是如何做研究的：从第一次与学校接触，到如何聚焦研究问题。读者可以从中领会人类学研究的特点——持之以恒，反思，不怕犯错，愿意承受深入别人生活所带来的紧张感，反复琢磨被观察现象的意义。总之，田野研究既要观察置于分析框架的指导之下，又要把握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和无序性特点，并在这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从拉鲁不断积累她的田野笔记，寻找研究聚焦点的详细描述中，我们深深